

一次教学功能最大化的尝试

——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

王世岳^{1,2}

(1.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93; 2.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高等教育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以高等教育功能为视角,对50年代院系调整的原因、目标、过程以及影响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院系调整是新中国成立后,高校为配合“赶超战略”,以重点培养工业建设人才为目标而进行的改革。通过院系调整、专业设置、课程统一的三位一体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权高度集中,为实现“赶超”提供智力支持。院系调整是大学教学功能最大化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高等教育功能;院系调整;专业设置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5)05-0045-06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5.05.008

进入21世纪新的十年,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尤其是诸多工科院校纷纷展开了建校60周年的庆祝活动。当人们追溯这些高校的历史时,“院系调整”几乎成为了它们共同提及的重要历史节点。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院系调整所带来的影响至今犹存。院系调整与当时国内的社会环境与经济体制存在着怎样的关联?是什么原因使得建国初期的渐进式高等教育改革跨入到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所谓的院系调整只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么?同时发生的专业设置、课程统一与院系调整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本文希望通过一个内洽的逻辑,来分析和解释以上问题。

一、“教学为中心”思想的确立

(一)建国后高等教育正常秩序的恢复与谨慎改革

从1948年秋开始,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军开始相继接收全国各大中城市。为了“夺取全面胜利”,包括在教育领域的胜利,解放军采取措施对大中城市的教育部门进行保护,并着手进行接管。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布告》,重申要“保护一切公私立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1](P32)}。在依靠军事力量接收包括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在内的国

内高校后,人民政府开始对各高校逐步进行改造。改造的首要工作是取消各高校原有的政治课程,取缔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并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政治课程^{[2](P32)}。新的行政机关还极力保留原有的教学秩序,并督促各个高校恢复教学。尤其是对于较有名望的教授,解放军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挽留,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完成对高等教育的初步接收之后,中央政府开始对国内的教育系统进行改革。1949年9月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2](P3)}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正式成立。1950年1月,教育部设立大学课程改革委员会,其中包括各系课改小组,任务是起草课程改革草案,并提交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以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3](P101)}。

1950年6月1日,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开始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对于高校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来自苏联的专家阿尔辛杰耶夫介绍了苏联为适应国家对技术干部的迫切

收稿日期:2015-06-07

作者简介:王世岳(1987—),男,甘肃皋兰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教育政策研究。

需要而将综合性大学改为“学院”的做法^{[3](P101)}。对于这一观点,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不同的意见。费孝通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发表了《教育者本身的教育——记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一文^[4],在其中对高等学校需要承担的责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将高校比作一只母鸡,母鸡的责任应该是培养小鸡,之后的小鸡再履行孵蛋的职能。现在的做法无异于只让母鸡下蛋,其实是浪费了母鸡所具备的优势。正是由于两种高等教育功能观点的交锋,使得这次会议最后只敲定了一份《高等学校文法理工各学院课程草案》,但这一草案其后并未被真正推行^{[3](P108)}。在这次会议上,教育要“配合国家建设需要”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后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则^①。为国家建设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寻找自己的价值取向之后,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二)“赶超战略”下“教学优先”原则的形成

在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加速了“院系调整”政策的出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这一事件使得中国,与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对中国教育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形成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对立关系。在政治上,中国开始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

策;在发展战略上,中国开始施行“赶超”;在教育制度上,也逐渐开始全面借鉴苏联模式。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院系调整”视为照搬苏联教育模式的结果^{[5](P108)}。在院系调整的过程中,中国与苏联的确具有很高的相似度。一位苏联专家总结苏联高等教育的改革时,将其特点概括为(1)按照生产部门的业务将大学旧有的某些系划分出来成为几个独立学院;(2)将某些专业从大学中分离出来,成立医学院、法学院、财经学院等单科性学院;(3)综合性大学大量减少,其余按照生产部门设立学院。此外,苏联高等教育改革的特点还包括详尽的专业设置,并由相关专业组成系^[6]。而这些特征在中国的院系调整中也均有体现。

从改革的对象和过程来看,中苏的高等教育改革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然而,仅仅通过对表象的分析,就做出中国的院系调整是照搬苏联模式的论断未免略显草率。如果我们对1951年苏联的高等教育结构与院系调整后的1955年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工科类学生所占比例远高于苏联工科学生所占比例,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和苏联在师范类学生与文科类学生比例之间的差别。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加注重工科学生的培养。两者间在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表1 中国(1955)与苏联(1951)高等教育结构比较^{②(P51-52)}

	工科	农林	医药、体育	师范及文科	财经	政法	艺术	总人数
中国	38.1%	7.4%	13.5%	27.7%	3.9%	1.7%	0.8%	28.8万
苏联	25.2%	8.8%	9.2%	40.3%	5.9%	3.7%	1.2%	123.1万

因而,判断中国的院系调整是对苏联模式的复制,是对院系调整的简单归因。如果对院系调整及其前后的逻辑脉络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院系调整与建国初期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紧密相关。

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实力薄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而重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9%^{[7](P4)}。

工业发展水平落后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就是工科院校和工科人才极度缺乏的问题。在民国时期教育水平最高的1947年,包括专科学生,全国工科在校生仅为27 579人,甚至少于法科学生^{[8](P1403)}。此外,由于高等教育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工科院校必需的校舍、图书仪器、教学设备都严重不足^{[9](P95)}。

工业技术人员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新中国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工科学生的水平还是数量,都无法满足当时工业发展的需求。为了满足工业生产对于人才的急切需求,1952年,教育部甚至发出指示,要求“理学院、工学院、水利、采矿、冶金、数学、物理、化学、气象等在1953、1954两年暑假应届毕业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以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急需”^{[2](P54)}。

在重工业基础薄弱、工业技术人才极其稀缺的状况下,中国仍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由于投资规模巨大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不相吻合,使得政府推行了包括压低利率、外汇、汇率、能源价格、工人工资、农产品价格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继而形成了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以保证国家的

“赶超战略”能够顺利进行^[10]。这一政策涉及到了社会各个系统。教育部门作为工业建设人才的培养者,也成为了计划经济生产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要为工业建设服务,就应该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技术人才。这些国家急需的工科技术人才,毕业后可以“分配”到最需要他们的岗位,在生产第一线从事工业生产,满足工业生产对于技术人才的急切需求。

然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规律。高等教育结构的形成受到了经济、文化、历史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各个高校间的设备、条件、师资力量各不相同。同时,以高深知识生产和传播为责任的高等教育具有很高的壁垒,使得中央政府的指令难以进入到课堂之中。为了使高等教育能够培养出符合计划经济生产需求的人才,就需要高校能够贯彻中央的调配。为了使高等教育机构能够配合经济计划的需求,就要将高等教育系统纳入到全国一盘棋的宏观调控之下。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高校系统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改革。

(三)“思想改造”与“教学优先”选择的确立

对于高等院校的改革,第一步是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改造。正如毛泽东在之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所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P184)} 思想改造,是为之后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造提供思想准备。

50年代初,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使得对美国的批判成为了主流。也因此,在中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实用主义思想,成为教育界中首当其冲接受批判的对象。对于旧有教育思想的批判首先从杜威开始,1950年,教育部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发表了《杜威批判引论》一文,倡导对于旧教育的批判首先要批判杜威^[12]。对杜威思想进行批判的实质,是对那些随国民党离开大陆,但当时仍然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思想的强行割离。

在对旧有的教育观进行批判的同时,新的教育思想也逐渐开始树立。教育学界开始讨论一些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高深学问为谁服务,谁最有资格享用“高深”的大学课程、课程知识要造就什么样的人等一系列问题^{[3](P135-139)}。尽管在学术圈内部对于这一问题仍然具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伴随着接下来“三反运动”的展开,唯物主义的知识观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到1952年夏天,思想改造运动接近尾声,全国有91%的高等学校教职

员工、80%的大学生参加了这次运动^{[13](P47)}。

这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改革旧的高等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1](P67)} 思想改造的完成为接下来院系调整的顺利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取得了知识分子对“教学优先”思想的认同之后,院系调整便开始在全国内迅速推行。

二、“教学为中心”思想的贯彻实施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P43)}。决定说:“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的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决定》中还规定:“该校教育方针,应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2](P7)}

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为新中国的文科类大学的发展树立样板。“教学为中心”思想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得以实践。无论是学生的构成、教师的课程讲授都秉承着高等教育“为工业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和“向苏联学习”的原则。此外,在工作的领导、组织、布置上都“面向教学,一切以教学为中心,为教学服务。”^{[1](P46)} 在课程的设置上,教学计划对课程讲授的指导作用已经开始体现:“要建设一个新兴的正规大学,必须学习苏联高等学校的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首先要制定精密的教学计划。人民大学的教学计划包括:本科各系、预科、专修科、研究生的教学计划,每一门课程的教学计划”^{[11](P95)}。

除了课程上的安排,人民大学还在学校的管理层面使用“大学—系”的两层次结构。在院系调整后,“这种两层次结构为全国各高等院校所采用,成为长期以来中国大学内部组织机构的主要形式”^{[14](P154)}。“学校—系”的组织结构摆脱了之前“大学—学院—系”中学院对于教学的影响。统一的课程配置,能够通过学校直接传达给系一级教学单位,从而使得统一的教学计划能够顺畅地加以实施。

在高校强调教学功能的同时,学校的科研功能被相应的弱化。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工作集中在了科学院系统。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不同于西方科学院的虚体设置,中国的科学院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实体,拥有研究所、实验中心等研究机构。尽管科学院模式来自于苏联,但与苏联情况不同的是,苏联的研究院多集中于航天、核

工业等国防科研领域,其所处的位置也处于较为偏远地区,以达到保密的目标^{[15](P88)}。而中国的科研院所集中于大学较为密集的地区,是大学科研力量集中配置的产物。大学的科研功能被单独剥离出来,由科学院来承担。由此可见,院系调整不只是对苏联模式的简单仿照,其各项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与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院系调整——教学资源的集中

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宣告着大规模院系调整的开始。如前文所述,国家为实现“赶超”而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策略。工科院系在这一规划中承担起为全面工业化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同时,学科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地域分布不均、班级设置不科学、师资力量不均衡都使得工科院系的原有情况,无法满足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于重工业发展的急切渴望。

这次会议提出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拟定了院系工学院调整的基本原则^[16]。第一,工学院从综合性大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科院校。第二,工科院校分为单科性和多科性两类。第三,若干大学相同门类的系科合并成为单科性工业大学^{[14](P183)}。之所以单科工业大学作为高校调整的重要成果,是因为单科院校既能保证对口工业建设部门所需专业人才的培养,又利于政府对大学实行有计划的管理与领导^{[14](P119)}。

对于国家急需的机械、电机、化工、水利、建筑等领域,教育部分别进行了分工和调整。使得各个主要的生产部门都拥有自己的部属高校,以培养各个部门所需的人才。1952年暑假期间,综合性大学和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类大学的调整相继展开。依照华北、东北、华东、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华南等大区的地域划分设立综合性大学和各类专业院校。

在思想改造之后,院系调整的速度极快。经过三个月的调整,在当年新学期伊始,许多院校就开始了学生的招生工作。经过院系调整,全国高等学校由原来的211所减少为180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3所,高等工业院校39所,高等师范院校31所,高等农林院校29所,高等医药院校29所,高等政法学校4所,高等财经学校7所,高等语文学校八所^{[3](P135-139)}。

除了院系间的合并和调整之外,院系调整带来最大的一项结果就是招生的大幅增加,1951年全国在校学生数量为12.8万,1952年这一数字急升至

21.2万^{[17](P190)}。其中工科学生比例由1947年的17.8%升至34.8%,而政法类的学生则由24.4%缩减到2%^{[18](P62)}。从中可以看出,院系调整后,大学人才培养的重心放在了工科人才培养之上。而以政法类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类不再受到重视,这也与当时的发展策略相吻合^[14]。

(二)专业设置——教学的统一化

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工业化生产要求统一标准。尽管院系调整完成了高等院校在地域上和学科上的规划设置,但是在统一标准的工业化背景之下,应该怎样培养出生产第一线所急需的“统一人才”,使得从学校走出的学生能够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颗统一型号的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便成为了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专业,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所谓专业,就是一个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按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专业”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高等学校的教学设施以专业为基础,系不过是学校里面的行政单位。政府培养人才的办法,是按照国家建设需要,确定专业的设置,并以专业为基础有计划的招生。每种专业,各有一套具体的教学计划,按照这种经过考虑的教学计划去学习,学生毕业后,即可成为哪一门的专家,立即可以担当其工程师或其他相当的职务^{[3](P186)}。

而专业设置的目的,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即将走上计划化。计划性的经济,必须由计划性的教育与之相配合,使建设所需干部,在质和量上得到及时供应,方能及时完成。教育要有计划性,惟一的办法,是吸取苏联经验,彻底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新的制度;而在此种改革当中,确定“专业”的设置,是非常重要的的一环^{[3](P186)}。

以上可见,为了达到为工业建设培养人才的目标,中国高等教育借鉴了苏联经验设置专业,以达到高校的教育与工作岗位间的对接。专业的设置,一方面提升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又剥夺了教育的基层组织对于教育的自主权。1954年7月,高等教育部开始了制定专业目录的工作,11月完成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其中分为工业、建筑、运输、农业、林业、保健、体育、法律、教育和艺术十一部门。作为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历史学以及各个理学学科都被归纳到教育部门之中。与之相反的是其他众多的工科学科被单独划分出来。以运输部门中的铁道运输类为例,其中就包含了经营性的工业运输和建筑类的工

业运输两类。从中可见工科科目的地位之高与专业目录划分之细。

“新中国第一份专业目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培养计划化的正式实行,大学完成了从建制层面上与计划经济的耦合。”^{[3](P209)}专业的开设,使得各个部门所急需的知识通过各个专业课程的设定加以传达。因而,专业设置使得教学权上升。各个学校的系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完成计划所制定的课程标准。伴随着高等教育权的逐渐集中,高校已经逐渐丧失了其他的功能,而课程的统一化,更使得高校的自主性被最后剥夺。

(三)课程统一——“标准化”教学

在专业设置的前提下,每一专业所教授的课程要加以统一。实现这一统一的方式是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计划之中,通常包含着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配置以及课程表四个部分^{[14](P210)}。

课程统一的具体过程是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讨论如开学时间、考试、毕业论文、周学时、课程重点等问题在内的具体问题。以工科为例,1954年初,高等教育部先后在北京、大连、天津、武汉等地召开了修订有关专业教学计划的座谈会^{[14](P225)}。并在其后出台了《关于修订高等工业学校四年制本科及二年制专修科各专业统一的教学计划的通知》,在这一通知精神的领导下,在1953年至1954年9月间全国工科院校先后制定了132个工科专业的统一的教学计划,参与者包括26所院校的千余名教师和前苏联专家20人。

再以规模相对较小的德语专业为例,经院系调整后,到1954年,全国仅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南京大学三所院校开设德语专业。为了建立统一的教学计划,1956年2月,来自三所学校的德语专业主任及主要教师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讨论教学大纲。在会上,教师们讨论了包括教学进度、学生应掌握词汇量等在内的具体细节,并形成大纲,在三校推行。

教学计划的实施使得在高校系统内部产生了“流动性”,即不同院校间可以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既包括教学内容上的可交流性,也包括教师和学生间的可交流性。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之间也可以适应相同的职位,而教师也可以在不同的学校间进行交流。此外,教学用具、教学资料都可以进行交流。为教育教学的统一提供了可能。

伴随着课程统一的实施,一项由“院系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统一”组成的高校教学功能最大

化的三位一体形成。院系调整将已有的教学资源高度集中,专业设置和课程统一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套以教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等教育体系宣告形成。

三、教学组——高度集权下“学术自治”的体现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以生产第一线的人才需求为导向,管理部门确定专业和课程,高校依据规划招生和培养学生,待学生毕业后分配至急需人才的岗位。尽管这一制度为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进行了细致的安排,但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使得单纯的计划体制不能满足高深知识传授的需要。因而,在高校基层出现了教学组这样的微观单位,作为教学工作的具体实施者。

除了公共课教学研究组隶属于校部或校教务部之外,大部分的教学研究组都设在系之下。与专业的设置不同,教学组的设立是由大学自行决定的。因此可以认为,专业设置满足了国家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教学研究组的成立满足了课程的需求。

教学组是在高等教育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高等教育的“自治”机构。在其中,高校中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毕竟,教学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即使是高度统一的教材,在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学生之间,仍然会有不同的教学过程。尽管学习的知识被高度集中化,但是在教学之中,仍然需要教育者和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反映。“学术自治”是高等教育的内在需求,在教学组中得以体现。

四、结论

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全国132个工科专业教学计划的颁布。其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首先经历了持续约一年的缓慢试点和渐进改革,完成了新政府对公有制大学的接管和对私立学校、教会学校的改造。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和赶超战略的实施,高等教育承担起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逐渐向专注教学的职能转变。

在确定了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的目标之后。高等教育界内部首先展开了“思想改造”,使得高等教育界形成共识,并为其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奠定思想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建立和运营为院系调整提供了样本,学校管理由之前的三级管理体制转变

为二级管理,以使得管理重心上移。为了集中优势资源,配套全国的工业生产布局,工科专业从各学校中剥离出来,依照地域和专业划分组成专业院校。为了使得人才的培养与工作岗位相对接,各个学校统一专业,统一课程,以求学生在专业学习后能够直接进入工作岗位,参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也为同一学科内教学师资的流动提供可能。一套高度集

中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此形成。

这套以教学为中心功能的高等教育体制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培养了急需的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赶超战略”的人才需求。然而,对于教学功能的一味追求,使得高等教育的功能难以得到全面地发挥,并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注释:

- ① 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词》,马叙伦说:“我们要在同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强调全国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一边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 ② 王清华编.《苏联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51、52页,其中的工科包括地质和矿床勘探、矿床开

采、动力、冶金、机器和仪器制造、电子技术、电器仪器制造和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和通讯、化工、林业工程和木材、纤维以及造纸工艺、食品工艺、消费商品工艺、建筑、大地测绘、水文和气象、农业和林业、运输等。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号 XC12-60。

参考文献:

- [1] 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2] 中央教科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 [3] 鲍 嵘.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 [4] 费孝通.教育者本身的教育——记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J].新观察,1950,1(1):33—35.
- [5] 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6] A·A·福民.苏联高等教育的改革——在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座谈会上的讲话[J].人民教育,1952(12):3—5.
- [7] 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简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
- [8] 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 [9] 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10] 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北京:三联书店,2010.
- [1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2] 曹 孚.杜威批判引论[J].人民教育,1950(6).21—28;(7),22—29.
- [13]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 [14] 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5] 胡雪峰.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 [16] 张宗麟.改革高等工业教育的开端[J].人民教育,1952(1):9—12.
- [17]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金光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18] 国家教委.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A maximized function of teaching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ese faculties in the 1950s

WANG Shi-yue^{1,2}

(1. School of Edu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combines teaching, researching and social services. This paper takes the fun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 perspective for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Chinese faculties in the 1950s in relation to causes, objectives, processes and influences. Hence, the restructuring helps to switch the func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support th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tructuring of faculty; major; curricular uniformity

[责任编辑 胡燕华]